联合国 S/PV.5922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十三年

第五九二二次会议

2008年6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哈利勒扎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	比利时	格罗斯先生
	布基纳法索	卡凡多先生
	中国	刘振民先生
	哥斯达黎加	乌尔维纳先生
	克罗地亚	维洛维奇先生
	法国	里佩尔先生
	印度尼西亚	纳塔莱加瓦先生
	意大利	斯帕塔福拉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埃塔利先生
	巴拿马	阿里亚斯先生
	俄罗斯联邦	多尔戈夫先生
	南非	库马洛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索沃斯爵士
	越南	黄志忠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08-39590 (C)

上午 10 时 0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埃利亚松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非洲联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萨利姆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非洲联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埃利亚松先生发言。

埃利亚松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和高兴今天能够和我的同事、我的好朋友、非洲联盟（非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一道，在安理会发言。成员们都知道，6 月 12 日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也向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作了通报。我们一道举行这些通报，说明联合国与非盟正本着《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精神进行从未有过的密切合作。

达尔富尔很能说明问题。这一冲突的复杂性和规模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就在三周前，安全理事会对非洲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包括对苏丹的访问，就是国际关系所涉及这个日益重要的层面的一个重要表现。

今天，我要介绍达尔富尔的政治进程和寻求和平的努力。成员们当记得，2006 年 11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达尔富尔问题高层协商中，与会者一致呼吁重振政治进程。2006 年《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没有得到大多数达尔富尔人的欢迎或接受。显然，还有必要团结未签署协议的四分五裂的各运动，并为各方进行实质性会谈做准备。到 2006 年 12 月，萨利姆先生和我被任命为负责现在这一任务的特使。

在 2007 年 3 月我第一次向安理会进行通报时，我报告说，各方在经历了达尔富尔四年的冲突和痛苦之后，都存在极度的疲劳感和沮丧感。但我也警告说，存在着主张维持现状或军事解决的声音。此外，我还对实地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表示了关切。

当时，萨利姆先生和我仍然认为存在着机会之窗，各方之间有进行对话的可能。我们指出，各方都有参与政治进程的某种意愿。当时国际和区域方面的情况看起来比较有利，正在努力造就部署非盟-联合国联合维和行动的势头。在那个时期，我们制订了政治进程路线图，于去年 6 月提交安理会。其目的是争取到去年夏末举行实质性会谈。

在过去 18 个月里，萨利姆先生和我敦促各方主要通过改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来证明其意愿是认真的。有必要建立信心，创造有利于和平谈判的环境。我们多次走访了达尔富尔由各运动控制的地区和该地区各处，敦促各运动搞好内部团结。我们敦促它们采取注重问题的做法，集中关注在权力分享、财富分享和安全领域的共同关切。我们强烈建议它们以统一的立场回到谈判桌上来。

我们还在喀土穆和朱巴频繁地会晤了民族团结政府的官员，并敦促他们显示出意愿和作出妥协，以加快政治进程。我们要求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克

制。同样，我们还敦促他们同我们讨论如何在会谈中解决权力和财富的分享以及安全问题。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实地人满为患的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我们同传统领导人一起坐在树下，我们去过很多当地的市场，这些市场都已空空如也、凄惨不堪。我们亲眼目睹、也从内心体会到，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达尔富尔已被忘记、被忽视。我们对所有我们看到的人都发出了同样的信息，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现在应当认真开展和平进程，以结束痛苦，结束政治上的边际化，结束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并结束达尔富尔今天普遍的不安全和恐怖气氛。

去年夏天的气氛是积极的。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769（2007）号决议。四个月里没有关于发生违反停火行为的报告。大多数运动都表示它们准备在夏末开始谈判。尽管各运动之间继续处于分离的状况，但也取得了进展，特别是 2007 年 8 月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各运动的领导人商定了会谈的共同纲领。

根据这些发展情况，潘基文秘书长和科纳雷主席决定 10 月在利比亚苏尔特启动正式和平谈判的第一阶段。尽管各方交流的基调是建设性的，但由于各主要运动的缺席，以及没有一个联合的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造成非常难以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条件还没有成熟。但和平进程的开始，对各运动加强统一的努力是一种推动，这些努力尤其得到了在朱巴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人解）的协助。萨利姆先生和我对为改组较小团体盘根错节的建制所作的努力感到鼓舞。我们看到出现了五个主要的派别，即：苏丹解放军——团结派、联合抵抗阵线、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沙菲派、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以及正义与平等运动——哈利勒·易卜拉欣派。

不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各运动希望走和平之路的意愿并非始终如一。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继续为参加会谈提出苛刻的先决条件。正义与平等运动——哈利勒·易卜拉欣派寻求军事解决办法，因而受到国际上的批评。这两个运动还表示，如果它们所谓的“分裂运动”参加会谈的话，它们就拒绝参加。联合抵抗阵线和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沙菲派对和平进程基本上态度积极，但仍在致力于解决内部的问题。苏丹解放军——团结派一直持合作态度，并宣布随时准备参加会谈。

去年秋初，正义与平等运动分裂，苏人解不再参与政府的工作。自那时以来，环境在持续恶化。乍得和苏丹之间的入侵和僵持突出说明两国间迫切需要建立睦邻关系。对乌姆杜尔曼的攻击证明，有人依然认为必须通过军事解决。阿卜耶伊地区遭到的破坏说明苏丹北部和南部继续处于紧张状态，说明协定得不到执行带来的后果。各运动与苏丹武装部队之间在达尔富尔持续发生冲突，以及部落民兵之间的冲突，都说明这种难以解决的冲突还在发展。

此外，实地还存在持续的暴力和可怕的人道主义条件。人道主义准入因各运动之间以及各运动与政府武装部队之间的战事而日趋恶化。攻击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资产、土匪行为、抢劫、甚至绑架和谋杀，进一步影响了进出和安全。这种情况给人道主义行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尤其影响到粮食的运送，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已不得不减少运送。全球粮价高涨和雨季即将到来，更让人不得不加以警惕。

当前，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应该是我们的首要关切。根据我们今年春天提出的“前进框架”，萨利姆先生和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大力强调要降低暴力的程度。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我们与各方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讨论各运动与苏丹政府本月初在瑞士举行非正式安全协商的问题。最后，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丹解放运动—阿卜杜勒·瓦希德选择不同意现在会晤，进行此类磋商。鉴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我们决定推迟。同时，我们继续在双边基础上与各方讨论安全问题。

在此背景下，今天我非常遗憾地报告，政治进程陷入困难状态。自从苏尔特会谈以来，各方始终不愿意坐下来进行实质性谈判。萨利姆先生和我感觉到，各方没有执行建立信任措施，改善谈判前景的意愿。

各方之间尚未建立信任，在有些情况下，完全没有信任。

各运动内部的分裂状况，继续影响他们对谈判采取一致的立场并做好准备。有些运动不仅不在可促进政治进程、改善达尔富尔数代人生活的问题上团结一致，反而争权夺利和内斗。他们忙于为谈判设置先决条件，而且措辞往往与现实脱节。最早成立的运动（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哈利勒·易卜拉欣）声称，他们比其他团体更具合法性。因此，我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责任，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与其他运动之间的合作。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运动确实非常不信任苏丹政府。他们对能否公正执行和平协议表示严重怀疑。他们把《全面和平协议》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视作不应该参加谈判的理由。继续袭击平民和在属于目前在难民营中求生的难民的土地上重新安置其他人的做法，无益于促进信任的气氛。我们还应记住，有资源、有责任保证达尔富尔和苏丹所有人民得到保护、繁荣和有尊严地生活的，首先是苏丹政府。

因此，萨利姆先生和我曾多次要求苏丹政府行使最大的克制，积极解决重要的冲突问题，具体显示他们对政治解决的承诺。此外，为了建立信任，为一个可信的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实现和解，尊重人权与法治至关重要。

我常问我自己，达尔富尔冲突为何如此难以解决？我已得出结论：因为同时需要四方面协调：国际社会、区域伙伴、苏丹民族团结政府，以及最后，达尔富尔境内各运动。但长期以来，在不同程度上明显缺乏这种协调状况。

现在，国际社会重要角色必须探讨和分析他们对当事各方和地区的相对优势。但为了取得进展，所有各方都必须承担责任。为了解决这场危机，需要实行更有效的分工合作。迫切需要外部行为体——国际组织、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联手施加影响，并利用双边影响，促使当事方停止进一步敌对行动，采取步骤，走向和平。在这方面，举行一次筹备到位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可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

为了成功，我们还必须从整个苏丹乃至区域的更广泛角度审视达尔富尔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考虑到下列几方面。

第一，《全面和平协议》的实施，对达尔富尔具有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建立信任方面，而且在达尔富尔和苏丹今后分享权力安排方面，均如此。

第二，没有苏丹和乍得两国关系正常化，达尔富尔不会有和平。需要协调努力，帮助和影响两国重新建立安全，履行现有协议，包括最近达成的《达喀尔协议》。

第三，和平需要各方表现出愿意妥协的政治意愿。这也要求重要国际和区域行为体提供更加可信的外交、财政和社会经济奖励和惩罚措施，包括在局势稳定的地区实施恢复方案。

第四，必须更加迅速、有效地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执行第 1769（2007）号决议，对于国际社会和安理会的信誉至关重要，对达尔富尔人民的安全与福安也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已通过许多国家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提供了勇敢的男女人员，表示对达尔富尔的支持。同时，我必须指出，任意挑选哪些国家有条件参加维和行动的做法，很难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无疑使和平进程复杂化。

第五，在武器泛滥的情况下，寻求和平的努力始终将受到阻碍。必须根据联合国禁运规定，更有效地制止武器流入达尔富尔地区。

最后，达尔富尔人民必须更积极地参与进程。我们在目睹妇女和儿童受苦最烈的时候，应当牢记第 1325（2000）号决议。平民百姓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苦难深重，他们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民间社会、传统领导人和流离失所社群代表不能相信，他们的意见将得到尊重，今后任何协议必将胎死腹中。他们的

利益，不仅仅是手上有武器的人的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在这方面，萨利姆先生和我欢迎苏丹政府最近承诺加强与达尔富尔民间社会的接触。

最后谈几点个人意见。我经常引用瑞典一句老话：你可以把马牵到水池旁，但无法强迫马饮水。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现在有理由认真怀疑，各方是否准备坐下来谈判，为和平作出必要的妥协。萨利姆先生和我已尽最大努力协助他们。现在马上又要任命一名联合国-非洲联盟全职首席调解人，继续这方面工作。调解人人选，在通知各方之后，将立即公布。萨里姆先生和我必要时愿意继续提供意见和帮助。

不过，任命首席调解人，其本身当然不会带来达尔富尔和平。如前所述，其他方面必须作出贡献，向当事方提供更诱人的奖励措施和更可信的惩罚措施。为此可能需要各主要当事方和我们各方在如何看待危机上转变思想。现在存在把冲突仅视为达尔富尔地区问题，不充分考虑国家和区域因素的倾向。

外部世界如同当事方，同样有责任结束这场悲剧。这场悲剧具有撕裂一个伟大的非洲国家，严重破坏区域稳定，危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五年多来，数百万人已蒙受巨大苦难。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新一代苏丹人有可能陷入在冲突、绝望和贫困中度过终身的命运。国际社会应当从导致人民长期滞留难民营，致使他们激进化的其他冲突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急迫调动苏丹国内和国外一切可调动的政治能量，首先制止敌对行动升级，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其次，为达尔富尔开始认真严肃的谈判奠定基础。但说到底，除非苏丹人民自己表现出认真的态度、政治意愿、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实现和平，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他们需要承担责任，最终解决长期危害达尔富尔人民和苏丹人民的各种悬而未决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先生的通报。我现在请萨利姆先生发言。

萨利姆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对有这次机会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感到荣幸。主席先生，在你主持下发言我尤感高兴。我意识到贵国为寻求结束达尔富尔冲突和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作出了重要努力。我特别意识到美国和其他国际伙伴们在我的同事加朋友扬•埃利亚松和我本人完成我们分别作为联合国特使和非洲联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所承担的任务时给予我们的积极支持。

我不是第一次就达尔富尔问题来到安全理事会。在 2005 年和 2006 年于阿布贾举行的苏丹达尔富尔和平会谈期间，我曾作为非洲联盟特使和主要调解人参加，该次会谈最终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当时，我曾数次向安理会通报。但这次，我是同埃利亚松特使共同这样做的，这显示了我们的团队工作和充分实际表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我们集体努力实现和平与安全，更具体的是在我们共同决心促进结束达尔富尔不幸冲突方面日益加强的合作关系。正如埃利亚松先生正确指出的那样，12 天前，我们两人曾有机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向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报。

在其今天发言中，埃利亚松特使详细充分地介绍了我们的共同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密集协商、路线图、工作计划、特别代表在联合调解支助小组的协助下并在区域和国际角色的充分支持下制订的各项方案和战略。这些方案和战略是为了使冲突各方来到谈判桌前。我完全同意他的发言。

16 个月前，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委托我们完成一项具体任务，即重新振兴政治进程。换言之，我们要为冲突各方——也就是说苏丹政府和各武装运动——创立有利条件，开展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对话，以更为可接受的方式，因此也是更持久的方式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在此期间，我们曾多次前往苏丹。我们特别访问了喀土穆、达尔富尔和朱巴。

在达尔富尔，我们广泛访问了一些不同地区，与武装运动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会晤。在这些出访中，我们与各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广泛的协商，他们包括《达

尔富尔和平协定》的签字方和非签字方、传统领导人、政党领导人、境内流离失所人士代表、民间组织、妇女和青年团体以及知识分子等。阿布贾和平会谈的不足之一是将整个进程限制在政府和武装运动之内。这一次，我们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确保尽可能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参加，或至少要与他们协商。

在喀土穆我们与各级政府领导人和官员的协商中，我们在欢迎政府愿意开展谈判的同时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措施，减少各运动的关切和担心，他们对政府非常不信任。我们强调，政府对维护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因此应该采取主动持久步骤，减少暴力，包括行使克制和停止空中轰炸，轰炸不可避免地会给无辜平民带来严重后果。我们还敦促政府在根本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灵活的态度，这些问题是目前分裂他们与各运动在未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要障碍。

在朱巴，我们也与高级领导人和官员进行了几次会谈。我们支持并鼓励他们作出努力，促进各运动之间的团结。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第一，我们认为，作为民族团结政府的一部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能够而且应该在实现达尔富尔危机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方面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第二，我们认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本身的经验及其与某些在达尔富尔的运动的历史关系将有助于鼓励他们开展谈判进程。

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精力和联合调解小组的有限的资源来鼓励和支持各运动所作出的努力，以便实现团结，或至少达成共识。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信，这样的团结将大大有助于和平进程，而且相反，继续分裂不利于达尔富尔的和平与稳定。在我们的努力和倡议中，我们与区域伙伴们相互协作和协商。我们还得到国际伙伴的支持。

2007 年 8 月阿鲁沙协商带来了一线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之后不久在正义与平等运动领导人之间发生的分裂，该乐观情绪破灭了。在去年 10 月苏尔特进程开始之后，并根据苏尔特经验教训——该经验教训使得由于某些主要角色的缺席而不得不推迟会谈——为建立某种程度的团结和一致加大了努力的力度。五大集团的出现——这样便可不必与约 20 多个派系打交道——应该得到欢迎。当然，更为理想的是我们希望这一局面在阿布贾会谈一开始便出现，也就是说，只有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但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依然仅仅是理想而已。此外，应该记住，各运动内部的分裂进程在阿布贾会谈还在进行之中便已开始。

因此，实地的现实是，各运动之间依然存在分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运动内部都存在分歧。另一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有些运动没有准备，或不愿意开展实质性谈判，甚至反对参加任何正式或非正式会谈。有些运动坚持要有显然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尽管他们的某些合理要求的确应该作为谈判的基础。还有些运动声称拥有绝对代表权，不接受所有其他运动。还有的运动似乎积极推行军事选择，正义与平等运动对乌姆杜尔曼的不幸攻击就说明了这一点。该攻击事件遭到国际上普遍谴责。

使局势更为复杂的是，分裂的进程还没有完全停止。简言之，政治进程陷入僵局，正如我们于本月初在日内瓦与区域和国际伙伴进行的一次会议上所强调的，有必要重新考虑如何向前推进的战略。在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一非常暗淡的局面和考虑如何向前迈进时，我认为必须特别考虑到下列因素。

达尔富尔人首先关心的是安全问题。每次我们与他们见面时，无论是在城镇或乡村，在政府地区或在叛军据点，他们都是这样向我们明确表示的。存在着涉及苏丹武装力量和某些运动的战斗。某些运动之间也发生着战斗。金戈威德民兵还在继续制造着恐怖。某些武装团伙还在制造着匪帮犯罪行径。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数达尔富尔人在急切等待着非洲联盟-联合国联合行动的部署，极为期望该行动的充分部署能够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部署无疑将大大有助于为发起和平进程创造有利气氛。

因此，愈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面临诸多困难，此种部署慢得让人受不了。之所以有这些困难，一部

分是由于苏丹政府在部队组成等问题上的立场，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国际社会未能果断行动。我们大家都承认，达尔富尔需要的是一支有力、装备精良且有合理流动能力的部队。在这方面，我认为可悲的是，尽管有几千架直升飞机，但还是无法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搞到二、三十架直升机，而广大国际社会也一再呼吁迅速部署有力的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保持警惕，以免达尔富尔人充满期望的欣喜之情沦为沮丧之情。与此同时，显然，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本身即便得到全面部署，并拥有必要的装备和后勤支持，也不会转化为达尔富尔的和平与稳定。混合部队将需要各方的配合，才能有效履行职责。首先，它需要有和平可以维护；因此，政治进程至关重要。

乍得和苏丹关系紧张且日益恶化，加剧了达尔富尔的不安全状况。为了乍得和苏丹两国人民的利益，缓和这种局面至关重要。两国达成的各项协定，包括在达喀尔达成的最新协定，亟须得到执行。显然，不缓解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两国不实现关系正常化，就不能想象可以持久解决达尔富尔冲突。

另一个极为令人关切、需要迫切关注和行动的问题是，虽有武器禁运，但武器仍流入达尔富尔。安全理事会应对此进行调查，堵塞存在的一切漏洞。

2006 年 11 月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总部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议，很多国家和机构，包括苏丹政府代表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与会。该会议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时任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总统共同主持的。会议就诸多关键问题作出了决定，包括重振政治进程和成立非洲联盟-联合国混合部队问题。6 月份在日内瓦提出了一项提议并得到了普遍接受，内容是视适当筹备情况，建议举行一次由潘基文秘书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召集的高级别会议，以便指明前进道路。建议与会者应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苏丹政府代表以及区域和国际伙伴。鉴于达尔富尔当前局势及其对整个苏丹和地区的影响，我们认为，应对该提议认真采取后续行动，以便尽快加以实现。由于处理这场危机需要新做法，这样的一次会议将提供一个独特的反思、审议和可能采取行动的机会。

鉴于前面的挑战十分巨大，需要有人来每天跟踪事态发展并与各方开展更经常性的接触，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扬·埃利亚松和我非常期望任命一名非盟-联合国共同首席调解人，他将常驻喀土穆。他将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积极支持。他肯定将得到两位特使和联合调解支助小组的全力支持。不过，更为关键的是，他将需要苏丹政府和反叛运动的支持。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强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都必须积极参与该进程，向各方发出正确信号和有力信息。它们应鼓励那些支持和平进程的人，切实阻遏所有那些对和平构成障碍的人。

达尔富尔爆发武装冲突到现在已有五年时间了。这五年对于达尔富尔人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五年，达尔富尔人民看到数万名同胞，包括他们的妻子和丈夫、母亲和父亲以及儿孙被杀害或致残，另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住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或是沦为难民。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结束这一灾难性冲突，为持久和平作贡献，从而使达尔富尔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生命免遭不断威胁。达尔富尔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仅对于苏丹这一西部地区的人民而且对于整个苏丹都至关重要，因为执行《全面和平协议》对于整个国家都非常关键。

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是缓解区域紧张局势和促进正常关系的任务。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机构，应利用其对苏丹和该地区的影响力，协助努力结束冲突并促进和平、安全与发展。但归根结底，责任在于苏丹人民自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萨利姆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要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埃塔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高兴地欢迎扬·埃利亚松先生和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来到安理会，并感谢他们通报情况。我们高度赞赏他们努力开展其复杂而艰巨——但也是崇高而光荣——的任务。

遗憾的是，达尔富尔安全局势在我们所审议的期间出现恶化。今天上午的通报、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访问达尔富尔期间对代表团所说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5 月 10 日正义与平等运动针对首都采取行动，以及部族、反叛运动和政府之间正在持续的暴力突显，有必要加快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并确保混合行动有能力保护平民，特别是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平民以及人道主义工作者。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与日俱增，这意味着需要援助和保护的人增多，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部署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工作出现延迟，如果说不上扰乱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动装备严重不足。比如，正如报告所示，由于缺乏必要装备，第一个埃及营的部署出现延迟。对埃塞俄比亚营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无论是来自埃及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所有这些部队都已做好部署到达尔富尔的准备。然而，那里的营地没有做好接纳它们的准备，阻碍了这些部队的抵达。此外，尼泊尔和泰国部队的抵达也出现了延迟。

我们在访问中同一些苏丹官员进行了会晤，我们听到他们表示他们无条件地配合混合部队的部署。由于部署混合部队显然有利于苏丹政府，而且从更广的角度来讲有利于稳定与和平，因而我们预计苏丹政府将与特派团一道，组成一个联合小组以克服阻碍部署的所有问题。苏丹官员明确表示，他们愿意让达尔富尔地区的机场一天 24 小时连续运营，尽管这要求克服技术上的缺陷，完成尚未完成的机场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之能够接纳为特派团部署的飞机。在这方面，文件 S/2008/400 中所载的报告第 29 段需要我们给予特别注意。其内容如下：

> “尽管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但是仍然缺乏关键的特派团能力，即 18 架中型通用直升机、6 架攻击直升机、1 个空中侦察单位、一个中型运输单位、一个重型运输单位和一个多种职能后勤单位。”（S/2008/400，第 29 段）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该特派团仍然面临阻碍其部署的种种缺陷。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能否成功部署混合特派团取决于能否提供其执行任务所需的一切。这是缓解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和安全状况，扩大政治进程成功机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先决条件。

6 月 5 日由两位调解人主持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与会者对部队的部署出现延迟以及由此给政治进程造成的不良后果表示失望。两位调解人今天上午在安理会也强调了这个事实。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各方，尤其是两名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政治进程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出现了倒退。一些反叛运动拒绝参加政治进程。此外，它们坚持继续实施暴力，尽管苏丹政府表示愿意进行对话，并且立即宣布实行单方面停火，而这一点在启动苏尔特谈判时就已提到过。

我们认为，除了支持两位特使所作的努力之外，安理会必须更多地重视政治进程，为启动和平进程提供有利的环境。我们认为这需要采取以下步骤。首先，必须通过支持因达成《达喀尔协议》而成立的联络小组的努力来实现苏丹与乍得之间的和解。在这方面，我同意萨利姆先生的意见，即如果苏丹与乍得之间不能达成和解，那么就不可能实现达尔富尔和平。

第二，我们应该将目标对准那些拒绝参与和平进程或试图靠现行办法来实现停火的个人和团体。安理会在这一点上已犹豫过久。一些运动甚至拒绝哪怕是仅仅参与指定的安全协商，尽管两位国际调解人作出了种种努力，而且各方也向它们发出了具体呼吁。向

那些采取积极态度的各方提供奖励，对和平进程也有益处。

第三，还应该更加重视并进一步支持民间社会和传统领袖。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部落领袖有着大大超过政治领导人的巨大影响力。我们相信，民间社会和传统领袖更渴望实现和平、稳定与安全。这是部落社会的现实。

第四，我们完全同意日内瓦会议各参与方提出的意见，认为武器仍然不幸地继续流入达尔富尔。因此，必须立即而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同意埃利亚松先生的意见，即有必要就他提出的六点达成共识。这无疑将对推进和平进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约翰·索沃斯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也要热情感谢扬·埃利亚松和萨利姆·萨利姆在18个月来所作的努力。他们今天的发言有一种告别式报告的味道。我们非常欢迎秘书长打算在未来几天任命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联合首席调解人；他昨天向安理会通报了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欢迎这一举措。我们完全理解，两位特使的作用将有所改变，并稍有后退。在达尔富尔葡萄园里辛勤劳动 18 个月，吃了酸葡萄，喝了难以下咽的葡萄酒之后，这一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如我的好朋友埃塔利大使所说的那样，安全理事会的访问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所有人反映了达尔富尔、喀土穆以及乍得实地存在的实际困难。我们也得出了两位特使今天向安理会汇报的许多相同悲观结论。我们向安理会通报了我们的访问结果，但我认为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埃利亚松先生所指出的六个要素与我们同样很重视的一些要素非常类似。我要逐一谈谈 6 点意见，我知道，这些意见同萨利姆先生在其报告中说的话广泛地重复。

首先，我认为，即便在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把该和平协议放在第一位是相当正确的。在苏丹，我们大家非常清楚地知道，《全面和平协议》是苏丹和平的基石。如果《全面和平协议》失败，那么，就毫无希望在短期或者中期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全面和平协议》保持在正轨上，联合国在这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仅在数周前在阿卜耶伊发生的事件显示，联合国的存在，联合国在实地部队的作用可更加积极，并且可更多地参与防止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导致多达 6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并且使苏丹南部一个主要城镇被夷为平地。

第二，在连续两天对苏丹和乍得进行访问之后，人们清楚地看到，边界两边局势密切关联。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正义与平等运动对喀土穆郊区发动的袭击。安理会还谴责乍得叛乱分子对恩贾梅纳发动的袭击。事实是，两边的叛乱分子得到另一方政府的支持。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实地的国际存在不能被当作一个保护屏障：在其背后，喀土穆政府和恩贾梅纳政府使安理会在喀土穆的目标难以实现。我认为，两位特使今天着重强调了在苏丹和乍得之间建立稳定和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绝对是重要的，因为没有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在达尔富尔取得任何进展。

第三，埃利亚松先生说的话使我印象深刻，他说，奖励措施和惩罚措施显然不够。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实行更多的制裁。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制裁是不是针对阻碍和平进程的人采取的混合措施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考虑，我们能够向双方提供什么奖励措施，以使它们进行接触。目前，这些奖励措施是不充分的。

第四，埃利亚松先生着重谈了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秘书长谈到在今年年底部署 80%这一目标。我们大家都知道，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在第一年受到各方所作的承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的困扰。在国际社会提供关键单位方面存在缺口，我们需要继续处理这一问题。正如我的利比亚同事所确定的那样，在联合国建设在实地接受新单位的能力方面存在缺口。在这方面，联合国做得还不够。苏丹方面存在缺口，在那里，大谈合作，但我们在实地看到的现实情况是，低级困难、有时是阻

挠持续不断。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不会是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却是我们需要正确对待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第五，埃利亚松先生着重谈到武器禁运。人们在达尔富尔感到十分震惊的是，任何有钱的地方恶棍可买一辆小卡车、一些火箭榴弹以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摇身一变成为民兵。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处理在达尔富尔可自由获得武器这一现象。这意味着，安理会全体成员必须做更多的努力，严肃对待我们对达尔富尔实行的武器禁运，并确保我们不会随随便便地销售武器，以免这些武器流入达尔富尔地区。我们有责任确保武器不进入达尔富尔地区。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考虑扩大武器禁运的范围。这是需要摆到桌面上讨论的一件事情。

第六，埃利亚松先生着重谈了达尔富尔人民。我认为，为使达尔富尔民间社会、社区团体、传统领袖和部落长老团结起来所作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达尔富尔的谈判进程被看作是民兵之间的谈判。然而，实际上正是人民必须共同生活，他们在那里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需要继续共同生活，尽管在紧张的状态下共同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自下而上地取得谅解，这将是我们工作的极为重要的部分。联合王国随时准备为使各方团结起来发挥作用，如果这样做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最后，埃利亚松先生并未提到的一个因素是有罪不罚问题。在我们访问了达尔富尔之后，安全理事会又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了解有罪不罚问题。卡比拉总统说，不能把正义搁置一边，并希望实现持久和平。这在刚果和非洲其他地方如此，在达尔富尔也是如此。

因此，带着这些想法，我想要表示，安理会今后在苏丹问题上有些非常严肃和困难的工作要做。这将是我们议程上最棘手的议题。我要再次说，我们非常感谢萨利姆先生和埃利亚松先生过去 18 个月来为努力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所做的工作，我们同样感到高兴的是，如果我们今后再次需要他们效劳，他们仍然随叫随到。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还请允许我向杨·埃利亚松先生表示欢迎，我选择记住他的大会主席身份。我当然还要向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表示欢迎，他的名字将永远与现在叫作非洲联盟的非洲统一组织联系在一起。

我首先必须说，去过达尔富尔之后，我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钦佩，即这两位特使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该地，试图帮助达尔富尔人民。事实上，我要说，那些总是问“达尔富尔的问题出在哪里？”和“能够做些什么？”的人也许应该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两位特使今天向我们所作的发言。尽管我们离开达尔富尔已有一段时间，但我仍然感到关切是，达尔富尔人民正在为达尔富尔呐喊。我有时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处理他们的呐喊声。我们大家都说，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应保持充分兵力。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即便以充分的兵力部署了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但它不能够替代对话和政治谈判。没有政治进程，可能会需要 20 万大军和也许在空中随时有 100 架直升机。当然，我们应该呼吁提供直升机，在达尔富尔如此迫切需要直升机。但是，没有政治进程，人们将需要使这些直升机每天 24 小时在空中盘旋，并且为达尔富尔人民提供各类保证，因为他们不仅遭到大自然的威胁，而且还遭到可能来自各种可以想象到的方面和来源的暴力。南非仍坚决致力于努力寻求达尔富尔局势的持久解决办法，政治进程是其非常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赞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先生在努力为和平进程注入新的活力方面所做的工作。

我对苏丹的访问令我印象深刻。在前去访问之前，我以为总的来说存在两个运动，一个叫做正义与平等运动，另一个叫做苏丹人民解放军，而且确实就是这两个运动，当然还有从这两个运动分裂出来的派别。但我在苏丹交谈过的所有人中，没有人认为正义

与平等运动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第一副总统萨尔瓦·基尔表示，正义与平等运动的目标从来都是改变政权，他们更关心的是改变喀士穆的苏丹政府。

我们当然都谴责正义与平等运动对乌姆杜尔曼的袭击，而所有了解正义与平等运动的人认为他们对达尔富尔并不感兴趣，这并不令人惊讶。达尔富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中间站，因为达尔富尔问题广为人知，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主席先生，因此我希望通过你向两位特使提出这个问题。两位特使的措辞十分婉转，说我们应当对他们施加压力。是不是应当对这些人采取严肃措施？是不是应当对这些人施加压力？当然，向苏丹政府施压是容易的，因为苏丹政府就在那里，但这些人却是从他们的小卡车背后开展活动的。是否应当找到办法，也向这些人施加压力呢？他们中的一些人居住在欧洲，因此如果我们想找到他们的话，我们是能做到的。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向苏丹政府施压。我想要问的是：有什么办法也向这些人施加压力呢？

根据我们刚才听到的发言，我想为即将被任命的这位首席谈判官祈祷。因为期望秘书长将任命的这位协调人介入这一局势，而且要比我们面前这两位资深的国际公务员做得更出色，这实在是要求过高了。我们必须提供国际社会将用来帮助这位协调人开展工作的工具。否则，这位协调人与萨利姆先生和埃利亚松先生之间的唯一区别只不过是他/她将一直驻在喀士穆。但如何我们要与在此已得到详尽描述的这些人打交道，或许我们需要谈一谈如何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在政治进程方面——我知道本次会议并不是为了谈这个问题——但我必须指出，我此前谈过这一点，而且我要再次表示，我对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资源如此不足感到十分惊讶。我讲过这个故事：我进入达尔富尔的一个营地，听到人们说“我们需要保护”，然后到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那里，认识到我们目前并没有援助他们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部署工作能尽快加速进行。

我想谈一谈埃利亚松先生的四部和声，我们来自非洲，在那里我们演唱不需要乐器。要确实有好的四部和声，人们必须都根据同一乐谱演唱，或记住同一首歌。目前，他所提到的组成这一四部和声的四个声部本身都没有同样的乐谱，那他们如何能在四部和声中同声歌唱呢？

我同意有关武器禁运和达尔富尔的武器扩散问题的看法。但是，只有当我们万事具备时，当有一个拥充分兵力的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并且有一个已在开展的政治进程时，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或许能发挥作用，然而目前，当达尔富尔人民问我们“你们能否帮助我们？”这个困难问题时，我们现在必须足够谦虚地说，我们还没有足够好的能力来帮助你们。我们确实想这样做，但我们只是还做不到。

刘振民先生（中国）：我的发言会很简短。中方感谢埃利亚松和萨利姆两位特使的通报。中方注意到，不久前两位特使在日内瓦主持召开关于达尔富尔政治进程问题的非正式磋商，为推动达区政治进程集思广益。中方赞赏两位特使及其团队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

目前达尔富尔形势不容乐观，各领域工作都面临挑战。国际社会应继续坚持“双轨”战略，充分利用“三方”机制，重点推进政治进程与维和部署。

正如秘书长报告指出，达区政治进程能否重启，关键是各方要有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中方支持任命首席谈判官，以整合国际资源，优化区域战略，向各方发出一致声音，特别是要向有关叛军组织发出明确信号，以促其尽快加入政治进程。

中方对混合行动的部署缺乏资源表示关注。希望秘书处继续加强与出兵国协调，争取国际社会提供急需的航空、运输和工兵分队。中方欢迎有能力的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向出兵国提供装备、培训等领域的帮助，以帮助秘书处加快维和部队的部署。

近期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对人道救援造成严重干扰，中方敦促有关各方避免袭击国际救援组织和人员，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达尔富尔地区将进入雨季，粮食短缺、道路不通、盗匪猖獗等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将进一步突出，我们希望联合国有关方面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努力。

里佩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特使的通报。我赞赏他们的决心和坚忍不拔。

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努力推动实现的政治进程对于达尔富尔实现和平至关重要。同我们所有同事一样，我们呼吁各方结束暴力和无条件地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这当然首先适用于正义与平等运动，法国和欧洲联盟谴责了该运动今年5月在喀土穆发动的袭击。这也适用于执政党，正如调解人在这里指出的，执政党近几个月对一些村庄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包括不顾安全理事会的一再呼吁，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空中轰炸和使用金戈威德民兵。最后，这也适用于达尔富尔的所有其他运动。法国政府在继续努力劝说阿卜杜勒·瓦希德·努尔重返和平进程。在我们期待一次真正的会议时，这一任务确实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国代表团赞同选择让联合调解人就安全问题组织与各运动的协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目前阶段的参与不够，不得不推迟举行协商。但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有可能使政治进程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尽管正如埃利亚松先生所说的，和平进程正在趋于建立，但也必须与民间社会进行谈判，以便倾听他们的期望，不让那些手持武器的人成为所有达尔富尔人的唯一代表。最后，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即将任命一名联合首席调解人加强调解班子。政治进程不是游离于危机其他方面的单独的进程。相反，我们不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不能指望能够推动政治进程。

有效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依然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联合国行动有保护人民和积极监督停火的任务。只要联合国行动没有执行任务规定的足够能力，平民就只能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人道主义工作者每日都面临生命危险，各方就会继续相互猜忌。因此，我们加强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十分紧迫。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到苏丹当局的充分合作，而现在仍没有这种合作。与此同时，我们认为，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决不应在承担责任上犹犹豫豫，特别是在组织更安全的车队和确保道路走廊的安全方面。在安理会代表团访问期间，我们看到这一任务是可以实现的。

打击有罪不罚的现象继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因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而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人继续在政府中任职，继续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劝说达尔富尔的人民坚持和平的真正愿望呢？达尔富尔人民有诉诸司法的权利。必须追究对在达尔富尔所犯粗暴罪行的责任人的责任。苏丹总统对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在这方面提出的要求的答复是不充分的。在这方面，我谨重申，欧洲联盟已表明准备考虑对那些继续拒绝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人采取更多的措施。

如上所述，切实执行《全面和平协定》也是使达尔富尔恢复和平的至关重要内容。实际上根据《协定》才得以建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对于使整个国家因而也包括达尔富尔恢复和平负有主要的责任。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最近在阿卜耶伊发生的危机已经解决，联合国因此能够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希望，南北进程能够因此而得到加强，从而有助于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达成全国性协议。它关系到苏丹所有人的团结和繁荣，对此我们尤其责无旁贷。

最后，必须缓和区域紧张。我们欢迎各区域伙伴、特别是利比亚和刚果承诺遵守《达尔富尔协定》。重建合作和睦邻关系，符合苏丹和乍得的利益。正如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所宣布的，喀土穆和恩贾梅纳的人民

都应远离武装叛乱团伙。这是各方建立互信的唯一途径。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进展，才能让重启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努力取得成果。因此，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对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的信任。

卡凡多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我也要感谢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两位特使的发言，他们的发言让我们全面了解了达尔富尔当前的局势，特别是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情况。我还要祝贺他们，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他们为确保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能够最终发挥效力和恢复达尔富尔的和平所作的巨大努力。

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最近对苏丹的访问让我们能够看到地面的第一手情况，能够全面评估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能够听取平民人口对于安全与稳定问题的期望。我们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所见所闻，与我们刚刚听取的报告完全相符。持续的暴力提醒我们注意迫切需要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我们已注意到苏丹政府作出的保证。我们重申强烈谴责所有暴力行为，无论何人所为。

苏丹政府和包括部落内部和派别团伙在内的各非法武装团伙之间的对峙，加剧了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因而危及当前的政治对话。不安全局势还影响到人道主义工作者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人员，使他们也成为受害者。这种局势将限制向易受伤害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出。

布基纳法索认为，各方，特别是各非法武装团伙缺乏参与实质性谈判的真正政治意愿，是解决危机的主要障碍。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呼吁各方同意和平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决定很快任命一名联合首席调解人加快开始谈判。

关于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正如我前面的几位发言者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高级官员强调指出的，我们注意到在部署这一行动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制约。现在缺乏行动的基础设施，缺乏工程能力（运输设备方面的困难），以及缺乏安全等等。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将面临危险。

我们对苏丹政府愿意促进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切实部署感到满意，我们注意到，苏丹政府希望，通过与苏丹有关当局协作，混合行动的一些关切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若要在不远的将来开始全面运作，就需要得到具体、有力、实质性支持。安全理事会应在这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我们感谢为混合行动提供支持的国家，同时呼吁所有伙伴帮助排除继续妨碍部队部署的各种障碍。我们相信，有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承诺，能够解决这些后勤问题。

正如许多发言者指出，寻求达尔富尔危机持久解决的努力，有赖于采取区域方法，特别是实现乍得与苏丹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在此，我们敦促两国开始建设性政治对话，恢复与支持执行《达喀尔协议》的联络小组的会议，同时当然不忘非洲联盟的调解作用。我们认为，在此基础上，能够建立达尔富尔乃至整个次区域持久和平与稳定。

斯帕塔福拉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热烈欢迎扬·埃利亚松特使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特使返回纽约，并感谢他们非常明晰的通报，以及他们坚持不懈地争取达尔富尔和平的努力。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令人沮丧的情景。事实上，萨利姆先生就用了“令人沮丧”的字眼。正如埃利亚松特使指出，“这场棘手的冲突目前还在发展”（见前文）。

我们理解，在那里，人们感到沮丧和疲劳。我认为，我们必须防止安全理事会成员也感到沮丧和疲劳。我们必须采取对策，必须预防。同其他人一样，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作了一切努力，但自 2006 年 11 月作出亚的斯亚贝巴结论以来，达尔富尔政治进程没有取得任何真正进展。既然各领域（政治、安全与维持和平、人道主义、法治以及杜绝有罪不罚现象）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一个领域缺乏进展对其他领域产生负面影响。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应当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为此需要安理会成员之间有更大的一致性和团结。

我还想，萨利姆先生所讲的是否完全正确，他说，“需要重新考虑今后的战略”（见前文）。后面我再谈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新考虑战略的问题，还是一个现有战略的现实存在缺陷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这一问题。

当然，我认为，任何新战略都不能超出埃利亚松大使描述的六大里程碑范围。我将不赘述这一点，因为索沃斯大使已经谈过，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不论采取何种战略，都不能超出这些里程碑范围。当然，诚如库马洛大使指出，我们必须确保一切到位，决不能任意挑选，顾此失彼。但我不敢肯定，我能否赞同库马洛大使的意见，即我们必须保持充分谦虚的态度，在听到要求帮助时，能够说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我怀疑我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做。是的，人们感到沮丧和疲劳，但重要的是，仍有希望。我认为，我们绝不能使这一希望破灭。如果我们使人觉得，我们现在不能提供帮助，以及希望可能消失，我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有责任不背叛人们希望依然存有的这小小的希望，而且我们必须保证有后续行动。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受到限制，因为有些人对公开、果断地实事求是地处理每一个问题有些犹豫不决。在座各位往往受到一种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态度的约束，即必须不惜代价做到面面俱到。因为苏丹政府确实有理由对政治进程感到关切，因此我们没有能够充分有力地解决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或保护平民问题方面的责任。同时，我们没有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说服叛乱运动加入和平进程，因为我们不想让苏丹政府以为，这是对其行为的一种奖赏。

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由此造成的局面。我认为，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评估我们的业绩，重新建立我们以同样的决心解决达尔富尔的各方面问题，但又对每一个方面问题给予必要重视的集体能力。

意大利认为，萨利姆特使谈到 6 月 4 日和 5 日日内瓦非正式协商中提出的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的意见值得考虑。但是，必须提前彻底做好会议准备工作。现在需要的是领导作用、方向和一项新的战略，不单单是集思广益。集思广益的时间已经过去。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还应当明确，我们是要调整战略，还是要改进战略的执行。但这一意见值得研究，我国代表团准备参加今后这方面的任何工作。

我还要对两位特使提出的有关迫切需要确保民间社会参与的意见表示支持。在因为埃利亚松大使所强调的叛乱运动四分五裂而难以知道谁代表谁的情况下，民间社会的参与尤其重要。在明年全国选举前，代表性问题尤为严重。事实上，意大利已经选择将我国对达尔富尔的援助主要用于民间社会，包括最近捐助 300 万美元给达尔富尔社区和平与稳定基金。

最后，主席先生，由于贵国代表团的努力，上星期我们有幸听到广大公众舆论重要代表的意见，他们提醒我们看到冲突的现实和人们对安全理事会的期望。在那次会议之后，我更加深信，我们所能做的最坏一件事就是对缺乏进展的情况习以为常，并且屈服于我先前提到的挫折感和疲劳感。我们必须单独和集体地承担我们在解决危机方面的责任，而不要让疲劳感压倒我们，为了达尔富尔人民，为了联合国的信誉，我们必须这样做。

纳塔莱加瓦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要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道，再次欢迎两位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萨利姆先生来到安理会。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他们为实现达尔富尔和平而作的努力。

今天的达尔富尔局势十分严峻，安全理事会本月早些时候在访问该地区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当地情况。的确非常令人不安的是，达尔富尔冲突出现加剧，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政治进程缺乏进展。然而，除此以外令人不安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在第 1769（2007）号决议于去年 7 月通过以及苏尔特政治进程于去年 10 月启动以后出现的。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我们必须把实现政治和解与达成政治协议置于解决达尔富尔危机工作的中心位置，为此我们必须消除冲突的根源，而不是它的表象。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各法院能够而且必须为政治进程提供补充，甚至为它创造条件，但却不能取而代之。

我们赞扬两位特使和联合调解支助小组开展的持续不懈努力和从事的艰苦工作。在必要的协商之后任命非洲联盟/联合国联合调解人因而十分重要。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需要更多地重视政治进程，并且采取必要行动支持这一进程。安全理事会还需要与秘书长一道，审查联合国的达尔富尔战略，并确定可在哪些地方作出改进。我们认为，对反叛分子有影响力的国际社会成员有责任施加影响。我们完全同意采取其他人提到的办法，即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们也理解，苏丹与乍得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推动在达尔富尔达成协议并实现和解。

然而，归根到底，当事方自己应该回到谈判桌旁，达成政治协议。它们需要理解国际社会对这项努力的特殊支持。国际社会并不经常支持和帮助反叛团体联合一致地同政府谈判。因此，必须让国际社会相信，这一行动方式仍然是最可行的。

安全局势日益令人不安，日益加剧人道主义局势。我们深为关切有报告说，人道主义组织因为安全局势恶化而减少了它们的行动。

尽管政治进程的目标并不是那么远大，但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工作必须按计划进行，以便除其他外加强安全并保护平民。秘书长在他最近一份关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报告（S/2008/400）中指出，整个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出现了恶化；部落团体之间、反叛运动之间、反叛运动和政府及其所属部队之间继续发生严重冲突；土匪行为继续增多，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遭到攻击。尽管面临这些困难，我们仍需要尽我们所能，帮助达尔富尔人民。

很显然，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需要尽量加快。当前存在着有待克服的实际障碍，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后勤方面的障碍。在这方面，我们敦促秘书处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总部同苏丹当局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协调与协商。

在达尔富尔采取军事办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讨论达尔富尔局势。有关各方都应该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尽管它们的力气还没有用完。它们应该把力气用于谈判，而不是用在战场上。我要再次指出，政治进程是关键所在。平民的困境和未来应是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充足理由。

格罗斯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两名特使，即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先生所作的通报。我还要感谢他们过去 18 个月来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希望他们知道，比利时非常赞赏他们的努力。

我们刚才听到的通报再次证实，达尔富尔政治进程陷于严重的停滞局面，人道主义局势仍然十分悲惨。我想在发言中重点谈谈几点。

当事方缺乏开展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这表明国际社会必须审查其有关该区域的总体战略。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为调解努力提供政治支持，向当事方施加影响，使其改变行为。

有鉴于此，在我们看来，关于由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主席召集一次高级别会议的想法无疑应该得到重新考虑，而且我认为，两名特使提出这项建议非常正确。应为这一会议做充分的准备，但我们认为，它能够使情况改观。

我们要坦率地说，长久以来，安全理事会对于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一直沉默不语。我们现在应该明确呼吁当事方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我们还需要认真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来对付那些阻碍和平的人，探讨我们如何能够对那些表现出诚意的各方给予正面的影响。

我们也欢迎即将任命一名联合调解人。我们需要确立机制，为调解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政治指导。

我谨表示比利时极为关切苏丹与乍得之间关系最近出现的僵局。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先生都提到了这一僵局。我们对边界两侧的反叛运动得到边界另一侧的交叉支持感到遗憾。我们呼吁苏丹和乍得尊重《达喀尔协议》的精神和文字。它们必须与组成联络小组的该地区国家和国际伙伴一道努力，尽快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

安理会已授权成立一个耗费巨大而又非常复杂的混合特派团，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达尔富尔的平民。国际社会的这一投入表明国际上更不容许达尔富尔冲突的当事方继续实施暴力，导致出现更多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受害人。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在理应得到其保护的平民遭受公开敌对行为的情况下，一个拥有众多军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无法真正执行任务，无论它有多少兵力，也无论它有多少装备。

鉴于政治进程陷入僵局，我愿重申执行《全面和平协议》的重要性。它是达尔富尔问题任何解决办法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全面和平协议》缔约方 6 月 8 日达成最终解决阿卜耶伊问题的路线图，我们呼吁各方立即执行该路线图。

最后，我不能不再次强调我国代表团高度优先重视的一个问题：消除达尔富尔的有罪不罚现象。苏丹在这方面负有双重义务——根据第 1593（2005）号决议与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合作，以及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制裁。上周，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S/PRST/2008/21），提醒苏丹有义务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包括向两人发出逮捕令，其中一人现在苏丹政府中担任部长。安全理事会必须坚持这一做法，而且只要有必要就必须提醒苏丹，它应履行该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黄志忠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首先，同其他人一样，我愿感谢联合国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非洲联盟（非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萨利姆·萨利姆先生今天上午分别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越南和秘书长一样，对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局势恶化感到关切。在那里，数万人仍无家可归，生活悲惨，并沦为各种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我们谴责针对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一切暴力行为。我国代表团还对达尔富尔安全和人道局势恶化深感关切。军事行动使得局势和政治进程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呼吁有关方面行使最大克制，停止军事和暴力活动。我们敦促反叛团体，特别是那些没有签署和平协议的团体，放弃使用暴力，参与和平进程，以期达成全面解决，确保有关各方的正当利益。

我国代表团高度赞扬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活动，特别是在部队人力和装备都未得到加强的如此艰苦条件下开展的活动。按照第 1769（2007）号决议按时、充分部署达尔富尔行动，对于促进政治进程、改善该地区的人道和安全局势极为重要。会员国应迅速兑现其向混合行动所承诺的捐助，以便部队能够完成任务。我国高度评价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发挥的作用，大力支持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萨利姆先生努力促进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我们也支持任命联合国-非盟联合首席调解人，他将协助特使的工作并推动和平进程。

最后，我们深感遗憾地注意到乍得与苏丹边境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致使双边关系紧张，区域局势复杂化。越南愿呼吁乍得和苏丹两国政府行使最大克制，遵守《达喀尔协议》规定，特别是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冲突。

维洛维奇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首先，和其他成员一样，我愿感谢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

萨利姆·萨利姆先生，不仅感谢他们今天的通报，而且感谢他们过去 18 个月所做的工作。我们愿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我们对达尔富尔和苏丹其它地区的局势在报告所述期间出现恶化深感沮丧。不仅是几个月前就很糟糕的安全和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且政治进程也陷于停滞，尽管一直在进行调解。各方显然没有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展实质性谈判的政治意愿。此外，某些方面没有以政治手段解决局势的政治意愿。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执行《全面和平协议》的核心作用。我们欢迎宣布任命联合首席调解人，并深切希望这将是为使各方坐到谈判桌上来而向前迈进的一步。安全局势、政治进程与人道局势之间始终显然存在着明显联系。达尔富尔也是如此。我们最近访问达尔富尔的经历表明，安全是所有其它工作的前提。我们看到了实地局势；我们与住在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的人进行了交谈，显然存在一种绝望情绪，而这主要是因为极为严重的安全关切造成的。

安全要素的一个方面当然是遵守和执行武器禁运。显然需要减少武器在苏丹和整个地区的自由流动。所有行为者都应全面遵守这一武器禁运。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正如今天和先前已经提到的那样，进度缓慢。即使到年底达到 80％的目标数字也不能令人满意。这不仅是部署的速度问题，而且也是装备问题。那也是我们面临问题的地方。在访问期间强调了——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直升飞机问题是最关键的。我们的责任应包括，努力确保不仅按时部署而且按时搞到设备。

有人提到，另一个前提条件是苏丹与乍得关系正常化。我们看到该问题不仅对整个政治进程产生影响，而且也对实地具体的安全和人道局势产生影响。今天，在通报中以及在我们的讨论中强调了，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参与未来政治进程。这不仅是指政府，不仅是指反叛运动，而且是指民间社会代表和传统领袖。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方向。我们在实地看到这一结构，即社会的这个部分有何等重要。

我们也欢迎宣布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但我们强调这次会议必须准备充分，今天大家已指出了这一点。我想是意大利代表说我们没有时间举行集思广益会议了，但我们确实需要准备充分的高级别会议。

请允许我指出，尽管达尔富尔仍应是我们的重点所在，但还有非常紧迫的问题不应被忽视。正如阿卜耶伊的不幸事件最近表明的那样，南-北冲突仍在影响许多人。因此，继续执行《全面和平协议》仍是重要和必要的。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已提出的一点。有人说在实地没有建立信任措施，明显缺乏这些措施。我们认为，此类建立信任措施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有罪不罚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在访问中强调的问题。我们看到，把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会大大有助于公众支持这些建立信任措施。我们在与喀士穆的官员们谈这一问题时，我们强调，我们坚信各方必须与国际刑事法院充分合作并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

多尔戈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特使扬·埃利亚松和非洲联盟特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感谢他们就如何推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以确保有效解决达尔富尔危机作了内容翔实的情况通报。两位特使所作的分析重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方面的国际努力，特别是通过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努力，必须侧重维持一个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主持的、达尔富尔各方之间尽可能有包容性的谈判进程。

我们认为，恢复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对派之间的政治接触，以迅速就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协议是最高优先事项。推动政治进程无疑会推动加强达尔富尔的安全。这还有可能加快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就达尔富尔危机的长期解决办法而言，政治解决方面缺乏持续进展使已作出的努力，包括维和努力失去效力。显然，部

署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本身不会带来危机的长期解决办法，尽管确实应当尽快部署工作。

我们同意两位特使的看法，即苏丹人自己对解决方案的命运负有主要责任，而归根结底，他们对该国的命运负有主要责任。迄今为止，通往政治解决道路上的障碍主要是一些达尔富尔的叛乱团体制造的。

我们今天听到两位特使证实叛乱团体继续分裂这一非常消极的现实情况。各叛乱团体领导人不能就一个统一的政治谈判平台达成一致。此外，正义与平等运动公开走上与苏丹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叛乱分子有相当畅通的渠道来购买武器并获得资金援助。无需重申，各方都必须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所有决定，包括关于武器禁运的决定。

我们认为，对于不愿妥协的叛乱团体领导人，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直到并包括采取制裁。我们非常认真地聆听了南非的库马洛大使发表的意见，我们同意这些意见。我们还表示，我们希望秘书长任命一位达尔富尔政治进程共同调解人——我们希望很快作出这一任命——将为重启达尔富尔各方的谈判提供重要动力。

当然，我们欢迎两特使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先生为重建达尔富尔的和平与正常生活作出的重要贡献。今后无疑还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知识。

我们完全支持并同意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平不可分的论述。苏丹南部解决办法方面的进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解决达尔富尔危机方面的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就解决阿卜耶伊问题达成的协议，并期望双方将充分执行这些协议。安全理事会最近有机会就此表明立场，我们仍致力于这一立场。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实现苏丹与乍得的关系正常化。我要再次表明，我们同意两位特使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同意他们的结论，即区域层面在解决苏丹问题方面是重要的，而且维护苏丹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对整个非洲大陆的稳定也是重要的。

乌尔维纳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最近我有机会与科特迪瓦的巴博总统交谈，我告诉他，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我国在非洲没有任何战略性介入。在我们研究非洲的现实情况时，我们努力本着善意精神这样做，并确实努力为该区域的和平进程作贡献。

我们正是以同样的态度处理苏丹和该地区的问题。我们多次在安理会主张采取区域办法。像约瑟夫·科尼这样的匪帮分子从该区域的一国逃窜到另一国，躲避追捕他的人。今天是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在追捕他，而明天可能是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或者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人人都在追捕他，但我们的努力是杂乱无章的。我们今天听到两位特使指出，该区域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必须首先把这个复杂问题作为一个完整、单一的问题来解决。

我要扼要地强调，苏丹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条件：联合国特派团的工作条件、特派团的安全以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在我们同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组织代表以及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会谈时，他们告诉我们，损失了价值约 200 万美元的车辆和设备。人道主义组织告诉我们关于生命损失和他们多次遭到袭击的情况。他们还告诉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实行的限制，以及乘租来的车辆无法前往某些地区。换言之，限制太多了。我认为，主要的责任在于苏丹政府，苏丹政府必须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社会。

在友谊大厦，我们 15 位大使听到总统顾问纳菲·阿里·纳菲先生毫不犹豫地谈到他的政府对于联合国行动的主要关切和保留。在聆听和阅读了两位特使的报告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各运动之间的内部分歧以及他们有意愿或无意愿参与所作的评估。我确实理解他们所说的话。我认为，他们的报告中几乎没有对苏丹政府的态度所作的评估。虽然这可以理解，但在我看来，如果对苏丹政府对于联合国的工作

的态度没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安理会就不能前后一致地采取行动。

值得回顾的是，联合国今年将在苏丹花费 23 到 24 亿美元。作为在该区域没有任何战略利益的国家的代表，我确实认为，该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行动极不信任。这是一个置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通过的各项决议于不顾的政府。这是一个并不将和平与正义联系起来的政府。这是一个抱着几分傲慢态度继续让艾哈迈德·哈伦先生担任其人道主义事务部长，并仍未将阿里·库沙卜先生绳之以法的政府。阿里·库沙卜先生是金戈武德的知名成员，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的对象。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行动的用意何在。

我赞成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先生的看法，即有必要让各级行动保持步调一致。我认为，国际社会和区域的努力都需要协调一致。我们还没有做到协调一致，但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继续努力。我认为，在对苏丹政府问题上使国际努力保持协调一致，当前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本着合作和做贡献和建立信任的精神，积极地处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调解人的想法。我们确信，在两位特使进行努力的同时，这样做能够有助于在联合国和苏丹政府之间建立信任。这种理解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确信，那些干扰达尔富尔和苏丹和平的各运动、民兵和团伙就能够将自身的问题解决。

主席先生，请原谅我脱稿发言。在聆听了我的同事和特使的发言后，我国代表团和我还想知道，两位特使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能否让安理会知道他们是如何评价苏丹政府的。

阿里亚斯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以及我的好朋友、前大会主席埃利亚松先生的通报。我还代表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感谢他们为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作出的不懈努力和个人奉献。我们希望他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大力开展工作。

当前，在苏丹正展开三个涉及到安全理事会的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进程。它们是：政治进程；混合行动的部署和实施；以及安理会将达尔富尔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这些进程中没有一个进程取得了所期望的相应进展。正如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先生指出的，和平进程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喀土穆政府和某些叛乱团体没有决定开始政治对话。此外，一些叛乱团伙得到了在该区域内外有影响的国际社会成员的支持。

关于混合行动的部署，虽然取得了一点进展，但喀土穆政府显然没有合作。此外，虽然联合国作了重大的努力，包括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的努力，但联合国无法汇集必要的部队和设备，使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能执行其任务。

关于安理会将达尔富尔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该法院已执行了交给它的任务。但安理会并没有提供该决定应该得到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不能不像索厄斯大使一样提及卡比拉总统的讲话：

（以英语发言）

“不能把正义搁置一边，同时希望会有持久和平”。

（以西班牙语发言）

除此之外，加上《全面和平协定》一再失败——阿卜耶伊镇最近遭到令人发指的破坏便是这种失败的一个写照——以及苏丹和乍得政府间的冲突，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不管斯帕塔福拉大使说了些什么话，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十分无奈的局面。鉴于这种局势，如果安理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不改变做法，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更协调地行动，我们便无法指望能够解决达尔富尔和整个苏丹的暴力。正如埃利亚松先生指出的，这需要我们对冲突各方采取奖惩措施。正如利比亚常驻代表指出的，这需要民间社会和传统领导人更积极的参与。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也指出，这需要加强当前的制裁，特别是武器禁运，必要时实行新的制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很多观点已经提出，讨论也已进行了一些时候。因此，我只简略地说几点。

首先，我感谢两位特使所做的工作和他们今天所作的通报。他们很好地描述了我们所面临的局势和挑战。他们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挑战；现在，面对他们所描述的情况，轮到我们提出该怎么办了。我想强调从他们的通报中提取的几点，并谈谈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二，局势当然可能恶化。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如何能够避免局势恶化。的确，如果《全面和平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如果南北协议崩溃——苏丹局势可能会大大恶化。因此，我们仍须关注《全面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这次会议之后，安理会将立即发表关于阿卜耶伊的主席声明；这将发出一个好的信息，表明安理会仍然参与和注重《全面和平协议》问题。这必须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继续集中关注的问题。

我要说明的第三点涉及安全局势。我认为，至少对我和我国代表团而言，根本问题显然在于：如果没有安全——或是改善安全，因为我们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有完美的安全——那么一切都面临风险。我确实认为，在目前这种程度的不安全中，不会有多少政治进展。稍后我会回头再谈政治问题，但我们知道，不安全的起因有很多。同时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也是相当大的一项挑战。影响安全局势的有内部、外部、宗教等各种因素。

对安全有很大帮助的一件事是部署有效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安理会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一致意见。遗憾的是，部署没有达到对部队预期的速度和效果。在我们看来，有各种挑战需要应对，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挑战之一是确保我们关注秘书处，确保联合国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做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几位同事谈到了后勤要求，这个问题需要处理。有各种资源可供利用：专用于这方面工作的资金。但我认为这方面进展很慢。联合国——秘书处——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多，我们也需要更加关注，以确保我们的意向得到正确理解，并尽一切可能加快速度。

同时，我坦率地认为，我们对苏丹政府一直不够强硬。我认为，该政府在建立一支有效力量方面可以说一直拖拖拉拉，各位同事也没有准备给该政府以适当的奖励。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能够和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部署一支有效的力量。有时，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意愿被用作一种掩护，用于回避在这些其他问题上受到压力，而它恰恰应该受到这种压力。我认为，我们需要以此为焦点，才能处理这一问题。

第三点是在当地部署适当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加倍努力促使国际社会确保提供各种能力，无论是重型或中型能力还是直升机。在我国而言，当然，美国将耗资约 1 亿美元用于装备非洲部队——至少 6 000 人——以使他们的能力提高到能够迅速部署。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加集中地鼓励部署或提供适当的资产。

我还认为，影响局势的因素之一是该地区的武器。我们需要审议禁运方面的情况——几位同事已经提出这一问题——并检查禁运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

我将简略地谈及第四点，即政治进程。这一点显然十分重要。没有政治进程，达尔富尔或苏丹就不会有最终的和平。已清楚阐述了各种挑战：反叛运动四分五裂；反叛团体之间意见分歧；政府的政策，不仅仅是对达尔富尔的政策——尽管它愿意谈判——还有已经提到的有关《全面和平协议》的政策；以及现存的区域争夺。所有这些挑战带来了重重困难。我们不得不考虑，是否有办法能够激励各方采取行动。我们每个成员能做些什么，或者我们——或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共同做些什么来做得更好？

我们对即将任命首席调解人表示欢迎。库马洛大使说，我们应该为他祈祷。我们要做的不止这一点：

我们将为他祈祷，我们还将同他合作。我知道，他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他的成功，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对冲突各方采取激励措施。

在我看来，鉴于存在的各种困难，如果我们指望短期内在政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那将是错误的。因此，我认为短期重点更应放在安全方面：在当地部署能力更强的部队，以改善安全环境。

我要谈的最后一点是，一些同事将局势描述为暗淡或艰难，我认为这种局势可能会令人疲倦，或者令人感到无能为力而不得不听天由命。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必须重申，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影响的局势，其影响不仅在于政治和安全方面，如同两位特使恰当描述的那样，还在于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状况方面。因此，它需要继续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当然，这是对我国政府而言。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鉴于我们已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正在花费的资源，以及人们愿意花费这些资源，这关系到我们安全理事会的信誉。

我们需要做的是调整方法以提高效力，因为在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与我们取得的结果之间确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我认为，两位特使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考虑、并且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我再次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和他们今天的通报。我国对两位特使致以崇高敬意。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埃利亚松先生回答所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埃利亚松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作了富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发言，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所表示的大力支持。我认为，我们已经确定我们未来前进的某些方向。

我感到高兴的是，成员们谈到了我在发言中提到的六点意见。至于其中一点，即北南与《全面和平协议》（和平协议）的关系，我愿向成员们提供一些更多情况。该关系对于达尔富尔，并且当然对于整个苏丹至关重要。

关于新任联合首席调解人的职权范围，我们提议设立该职位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将建议他考虑到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问题。我们的职权范围中没有包括这些标准，但我们希望，鉴于本次讨论，这会被视为建设性的前进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讲，任务扩大了，但不是正式扩大，要求调解人详细处理这些问题。但是不考虑到比如与乍得的关系以及与《全面和平协议》的关系，就不可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

我愿提到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对我的朋友库马洛先生提问的回答，安全理事会采取激励和劝阻措施以及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的问题。这个问题萨利姆先生和我难以回答。我们做的是调解，是使各方坐到一起。我们努力就局势提交公平的报告，但从我们的报告中得出何种结论则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不过，我必须说，在我们谈判过程中，知道并提醒各方注意安理会必须采取的某些措施，而且有某些工具可用，是颇有助益的。我特别记得 2007 年 10 月 24 日安理会发表的主席声明，其中表示，阻挠政治进程或维和行动或人道行动的各方——当然包括政府和反叛运动——都将受到安全理事会措施的惩罚。有时，萨利姆和我提醒各方安理会要采取的行动，当然这起到了作用。我认为，目前应开展类似讨论。

我想重要的是，成员们既要看到激励措施也要看到劝阻措施。谈判也必须成为对反叛运动来说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在此，我认为政府可以发挥特别的作用，不仅是作为拥有资源和对国家安全与繁荣负有责任的一方，而且也是作为能够至少就分权和分享财富以及安全问题提出建设性想法的一方。

反叛运动一直在要求对它们在 2003 至 2005 年的悲惨遭遇予以赔偿，并要求解除金戈威德民兵的武装。我们正在要求政府发出更具体的信号，从而使激励措施也来自政府方面。我认为重要的是安理会要作新的提醒，类似于 10 月 24 日主席声明发出的信息，而该声明源自其最近对这些问题的审议。

有人问我正义与平等运动是否有全国议程。是的，它确实有全国议程。我想这是政府对该运动作出的反应要比对其它运动作出的反应更强烈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就在几周前，它们对喀土穆附近的 Umdurman 发动了袭击。

我要说，我们或许应继续鼓励与该运动谈判或对话。政府现在正力图把该运动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等等。我们作为调解人是不会参与这样的事情的。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给予该运动沟通渠道，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通常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得出以下结论，那就是，最终必须要与自己的敌人对话，要与对结束冲突起作用的各方对话。

有人提到了有罪不罚问题。再说一遍，这不是我们谈判任务的一部分，但我仍愿重复我在情况介绍中表明的一点，而这使我们能够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该问题。尊重人权和法治对于建立信任、对于开展可信的政治进程，以及对于实现和解至关重要。我们是从大的角度来表明这一看法的，我认为这种角度是适当的。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安理会主席对今天会议所作的很好总结。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陷入绝望和被动。相反，由于局势达到如此严重地步，而且条件十分不利——我们一直在现场，我们看到妇女哭着要水，看到儿童可以说死在我们面前，看到人们眼中的绝望——我想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采取现实做法，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我认为短期前景应是所有人都应感到有责任确保敌对行动不升级，事实上，确保我们朝着停止敌对行动的方向迈进，并对任何走军事道路的人采取极为严厉的行动。

达尔富尔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证明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不仅是调解人、安全理事会还是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而且我们每个人也应如此。我们代表的是那些，主席先生，在这里，在这个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极大的机构中担任成员的国家。

因此，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调动我们各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我们只有这样做，只有表明有一个谴责不安全和阻止升级的坚定阵线，我们才能作出贡献。通过这样做，正如主席先生你刚才所说，我们可以创造环境，然后在其中采取步骤，更多的是在中期，但是要尽快，来开展可信的政治进程。我想这是一项工作。这不会使我们陷入无望，而是一种现实做法。让我们处理安全问题，然后再采取步骤，开展可信的政治进程吧。

就说那么多，我感谢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给我们机会来进行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如此公开和透明的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先生的说明和回答。

我现在请萨利姆先生回答有关评论和提出的问题。

萨利姆先生（*以英语发言*）：和我的同事一样，我愿感谢安理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感谢安理会对于该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我还要简短回答提出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政治进程与安全问题之间的联系。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能够达成协议，这样的话，每个人的日子都会更好过，特别是对维和人员来说。但那是理想情况。实地现实是没有这样的协议。实地现实是，不解决安全问题，政治进程就不可能开展。

我们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讨论什么，无论是同流离失所者代表还是同民间社会代表讨论，无论是在我发言所谈到的地区、政府控制地区，还是在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所有人都在谈论安全、安全、安全。因此，该问题十分重要。因此，迅速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十分重要。

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谈一件事。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曾在那里，在非常、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做了很多工作。但非苏特派团因为没有所需的资源和装备而开始失去信誉。现在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如果不采取措施，真正加强达尔富尔行动，那么，它将面临和非苏特派团一样的问题。我先前谈到充满期望的欣喜之情。我们在达尔富尔时，所有人都在等待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所有人都在谈论开

展该行动有多么重要。但是，当他们开始看到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与非苏特派团之间的差别真的很小时，就会出问题。因此，我想，切实有效地处理该问题不仅有利于和平进程，而且也有利于安全理事会的信誉。

我想，民间社会的参与是必需的，而且正如扬指出的那样，最初，政府和反叛运动曾完全反对让民间社会参与的任何设想。现在我们开始看到某些变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苏丹政府已明确告诉我们，他们支持有关公民社会的想法。不过归根结底，必须让这些人参与进来，因为无论是苏丹政府，还是这些运动都不能宣称，他们完全代表达尔富尔人民。人们渴望和平，无论他们是传统领导人，还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一局势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达尔富尔人民希望和平，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政治派别、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他们都渴望和平。

关于激励措施和劝阻措施的问题，我想我的朋友扬已正确作答。他使用了“激励措施”和“劝阻措施”的措辞。如果各位通读一下我的发言，你们会看到我使用了“鼓励或劝阻”的字眼。但在根本上，我们所说的是安理会必须能够有所作为。我谨提请防范一再发出没有后续行动的警告，譬如这样的警告：“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做，又会怎么样”。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不仅会危及安理会的信誉，甚至那些参与和平进程者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受损。因此，我要说，是的，需要鼓励或者激励措施，也需要阻止或劝阻措施。

关于包容性的问题，我认为包容各方是非常重要的，扬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了解苏丹政府的立场。我们知道在发生对乌姆杜尔曼的攻击后他们的感受如何。不过，国际社会的反应一直都是迅速的。此外，人们不能说某一方应当被排除在外。我认为应当是运动本身把自己排除在进程之外。不应当在一开始就把人们排除在谈判之外，特别是一个得到一定支持的运动，虽然我完全明白，正如已正确阐明的那样，人们觉得正义与平等运动的议程超出了达尔富尔问题。

具体回答哥斯达黎加代表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在我们两人的发言中，我们都明确指出苏丹政府必须对达尔富尔局势负主要责任。苏丹政府在有些方面尚未对我们期望他们做的事情作出回应。例如，我们每次去喀土穆，都一再呼吁不要使用空中轰炸。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应要适度。我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如果发生攻击事件，例如正义与平等运动的攻击，苏丹政府进行自卫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如果使用空中力量，而且空中力量影响的不只是该运动，而且还影响普通平民的话，那就有问题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的原因。

其次，在当前这个时候，很难在谈判方面追究苏丹政府的责任，因为他们一直都表示愿意谈判。也许我们可以说，尽管他们说愿意谈判，但可能他们心里并不情愿。不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争辩，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争辩。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达到一个苏丹政府将接受考验的阶段，而他们只有在谈判中才能被考验：你们在共享权力方面的立场是什么？你们在财富共享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你们对安全问题的立场是什么？如果我们到达这个阶段，那我们就可以说苏丹政府在谈判问题上究竟是否在合作。

最后，根据我处理达尔富尔问题获得的有限经验，我要指出：在我们谈到激励措施和劝阻措施时，必须普遍适用这些措施。尽管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苏丹政府负有主要责任，但认定一个方面都是好人而另一方面都是坏人，那将是错误的。情况也并非如此。因此，换言之，必须与好人和坏人打交道，无论他们出现在那里，不管他们是来自政府方面还是叛乱运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萨利姆先生的发言和所作的澄清。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12 时 45 分散会。